

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机制、困境与应对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张佳佳, 曲鲁平

(曲阜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体重管理年是我国应对慢性疾病高发态势、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研究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推理等方法,借由中观取向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简称ANT),分析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机制、困境与应对。研究发现,体重管理年的出台,既是实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目标的具体要求,也是回应国内肥胖人群比例激增的实践需要,更是响应国际社会健康治理转型的世界趋势。其运行机制本质上是一个以各级政府为主导,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和理念文化、政策法规等创新要素共同作为行动者参与的实践过程,具体涵盖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与异议排除等环节。但当前体重管理年活动仍面临着制度空转所致的转译愿景锚定不力、主体分化所致的转译合力不足、网络弱化所致的转译效能不佳等困境。研究提出从制度完善、主体激活与网络保障等维度入手以应对转译困境,推动体重管理年落实落地、更好更快发展。

【关键词】: 健康中国; 超重和肥胖; 政策优化; 全民健身; 异质性; 非实体行动者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6)03-0092-12

DOI: 10.15877/j.cnki.nsic.20260108.001

“体重管理”事关人民的健康福祉和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大局^[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3]。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体重管理正从个体健康选择升级为社会公共健康议题。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发布《“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旨在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推动部分人群体重异常状况的改善^[4]。实施体重管理年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重要指示的具体体现。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关键是引导群众建立正确健康观,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把以“治已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促健康”为中心^[5]。从《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到《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7年)》,再到体重管理年活动系列政策出台是国家近些年建立健

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全方位有益探索。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开展突显了党和国家对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视,是我国应对慢性病高发态势的重要抓手,也是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创新实践,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6]。当前,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体重自我污名^[7]、体重影响因素^[8]以及体重干预^[9]等议题展开,侧重于具体手段层面的微观研究,疏于体重管理层面的宏观分析,尤其是对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机制、困境与应对缺乏足够关切,因而既往研究所形成的实践方案在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方面尚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基于此,研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全面分析体重管理年活动中各类行动者的角色属性、利益互动及其联动关系,揭示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运行机制,

收稿日期: 2025-09-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BLA240186)。

第一作者: 张佳佳, 博士生, 研究方向: 体育政策与运动健康促进。

通信作者: 曲鲁平,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政策、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

厘清体重管理年活动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以期为我国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开展提供经验参循。

1 三维向度: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动因的具象呈现

作为一项战略性健康治理工程,体重管理年的

发起与实施源于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因推动。它既契合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回应了国内肥胖人群体重管理的实践需要,还响应了国际健康治理的世界趋势。“战略要求—实践需要—世界趋势”三位一体的多源动因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推动了体重管理年从政策理念转化为全面实践(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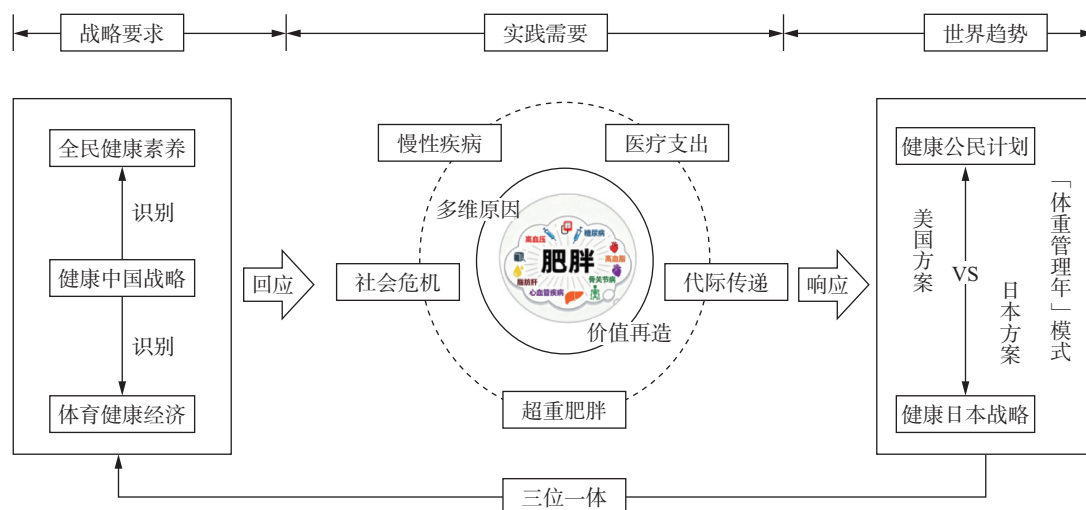


图1 体重管理年的三维实施动因

Fig.1 Three-dimensional implementation motivations for the weight management year

1.1 实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目标的具体要求

一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中“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核心目标。体重管理年通过向居民开展体重管理知识普及、体重管理竞赛等健康专项行动,推动了全民健康素养的提升。例如,河北省衡水市开展以“‘衡’健康 共享‘瘦’”为主题的健康减重大赛行动,依托多种渠道推送减重健康知识、减重案例,提高居民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二是带动健康中国战略中“体育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作为首个在官方政策中明确提出“体育健康产业”的实践载体,体重管理年活动倡导健康消费新理念,推动体育健康产业不断创新。在其实施过程中,从健康食品、健身服务到健康监测设备等领域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契合健康中国战略中关于推动健康产业发展的要求。三是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度融合。全民健身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10],体重管理年为两大战略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契机。以体重管理为抓手,推动运动参与个性化与健康管理科学化,形成“运动促健康、健康引运动”的良性循环,为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协同推进注入动力。

1.2 回应国内肥胖人群比例激增的实践需要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2018年我国成人超重与肥胖率已分别达到34.3%和16.4%,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11.1%和7.9%,且呈现上升态势^[11]。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中进一步预警,如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预计到2030年,我国成人与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超重肥胖率将分别上升至70.5%和31.8%^[12]。其一,超重肥胖诱致慢性疾病危机。体重水平与人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体重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多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如高血压^[13]、血脂异常^[14]以及多种癌症^[15]等重要病因。其二,超重肥胖导致的慢性疾病医疗支出加剧公共卫生财政压力。目前,体重超重原因导致的医疗支出正加剧形成系统性财政压力。我国由肥胖导致的主要慢性病经济负担达907.68亿元,占主要慢性病总经济负担的42.9%^[16]。就经济学视角而言,实施体重干预是缓解公共卫生财政压力的必然选择。其三,超重肥胖引致国际竞争效能衰减。国民健康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基础条件^[17]。在全球竞争力评

价指数中,人力资本所占权重已经进一步提升。而我国因肥胖及其衍生的慢性疾病造成人力生产力受到损失,使得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较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尚存差距。

1.3 响应国际社会健康治理转型的世界趋势

超重肥胖作为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已跨越地区与发展阶段差异,形成跨文明形态的共性挑战。20世纪80年代始,美国通过“健康公民”系列政策,将体重治理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呈现出多部门协同、多政策交融的治理结构^[18]。相较之下,2000年,日本在《健康日本21》战略中将体重管理视为慢性病预防的核心任务,系统推进国民超重问题的综合治理,优势体现在制度的精细化与利益的协同化^[19]。例如,基于统一的健康管理应用程序,日本高知县联合便利店与铁路公司等市场主体,将居民日常的步数、运动消耗的热量等数据转换为健康积分,积分可以在政府合作的商户中购买产品或相关服务。通过对居民提供实质激励以及对企业提升客流量等多方利益赋予,有效激发多元主体参与体重治理的内在动力。而欧盟则是将肥胖预防纳入“地平线欧洲”计划,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超重和慢性病风险人群的动态预测^[20]。欧盟的实践以数字治理和跨域协同为突出特点,在遵循数据安全原则基础上,推动健康数据的跨境流动,形成了以技术标准作为纽带、以数据驱动为支撑的一体化治理模式。

就美国、日本与欧盟等国家地区的治理实践而言,有效的体重治理依赖于政策引导,更在于构建一个以“非人类行动者”为支撑的运行框架,即对技术、数据与制度等物质性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将抽象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机制,并且借助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转译策略,不断激发体重管理年网络的内在活力。基于上述逻辑,我国在推进“体重管理年”进程中,应深化数据的互联互通与技术赋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并推行统一的体重管理数字化平台;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赋予机制,增强社会力量的参与意愿与协同治理能力。目前,全球超重与健康治理已进入“预防优先、数据驱动、协同共治”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开展体重管理年活动是回应国内肥胖人群比例激增的实践需要,也是响应世界超重与健康治理趋势的政策选择。

2 ANT:推动体重管理年活动有效运行的可能方法论

2.1 行动者网络理论内涵及其适用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探讨社会实践中多元要素如何互动并形成稳定网络的方法论^[21]。ANT的核心概念包含3个方面:一是“行动者”(Agency),即任何能够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技术、政策等非人类行动者,其中对实践起关键作用的被称为核心行动者。二是“转译”(Translation),指核心行动者用自身语言对其他行动者的利益诉求进行转换表达,涉及“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异议排除”4个环节。成功的转译需要通过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来实现,即要构建一个稳定的行动者联盟,赋予行动者利益,使其朝着共同目标努力。三是“异质性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即不同行动者组成的动态网络联结过程^[22]。

行动者网络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技术、管理、社会等学科领域^[23],对于分析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机制也具有一定适配性。一是就行动者维度而言,ANT强调所有人类和非人类都是潜在的行动者^[24]。作为一项系统性社会行动,体重管理年活动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多元行动者的协同推动。其中,资金技术、政策法规与文化环境等非人类行动者是支持、辅助或影响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意识形态或物质实体,与人类行动者共同建构起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行动框架与运行秩序。以体重管理App(应用程序)为例,其绝非被动的数据或服务工具,而是通过算法推荐、实时反馈等技术逻辑,介入用户健康行为的塑造过程,并重构政府、社区等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二是就转译机制而言,参与“体重管理年”的各类行动者均具备独特的资源与利益诉求,其在互动中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异议排除等环节不断协商与结盟,以推动体重管理年活动的稳定运行。三是就网络构建而言,体重管理年活动的结构赋能与主体互嵌不仅天然具备多元异质行动者及其复杂关联所构成的网络基础,还随政策演进与环境变迁处于持续演变之中,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的网络动态性与建构性,可用于探析体重管理年运行的过程机制与维系方式等。

因此,研究拟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出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分析框架(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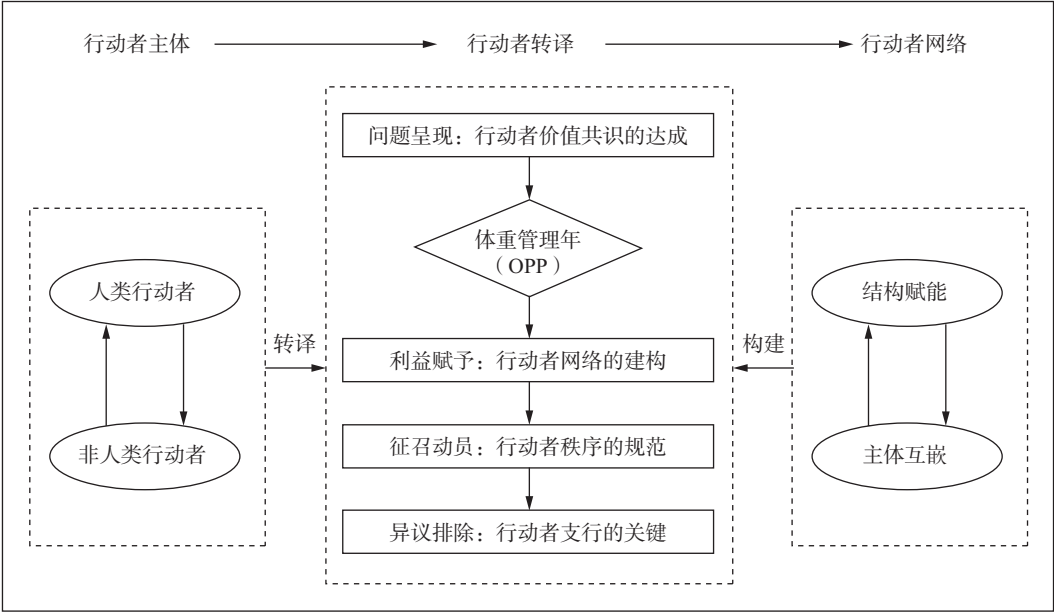


图2 行动者网络理论构成要素及分析框架

Fig.2 Element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ctor-network theory

2.2 ANT 视域下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理论分析框架

研究为系统解析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内在运行机制,推动活动从“形式集合”向“有机网络”转化,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关键框架要素,构建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图3)。

ANT 视域下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运行是一个由多元行动者交互、转译环节驱动及行动者网络建构的演进过程。该网络由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前者涵盖政府部门、目标群体、社会组织与企业公司等主体,后者包含资金投入、政策法规、治理平台以及标准指标等要素。这两类异质行动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度交织并共同嵌入“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异议排除”的转译环节。具体而言,政府部门作为核心行动者,首先通过

“问题呈现”确立共同目标(OPP);继而借助非人类行动者的中介支撑作用完成“利益赋予”,以激活各方动力;随后实施“征召动员”,以规范各主体角色与行动秩序。在此基础上,针对网络构建中伴随的内部异议与动态博弈,政府部门需进一步发挥统筹职能,通过持续沟通、资源调配与规则优化来化解冲突、维系稳定。由此可知,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运行机制实则是以政府为核心的行动者通过持续的转译实践,将分散的异质要素系统整合为有序治理网络的动态过程。

3 ANT 视域下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过程机制

ANT 视域下,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运行过程可以解析为,在强制通行点的统领之下为维持运转和实现目标而相互关联、作用的原理与过程(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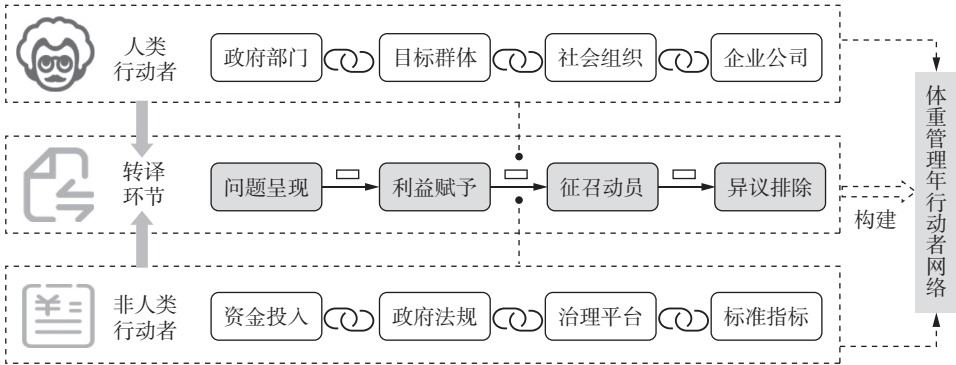


图3 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3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weight management year activ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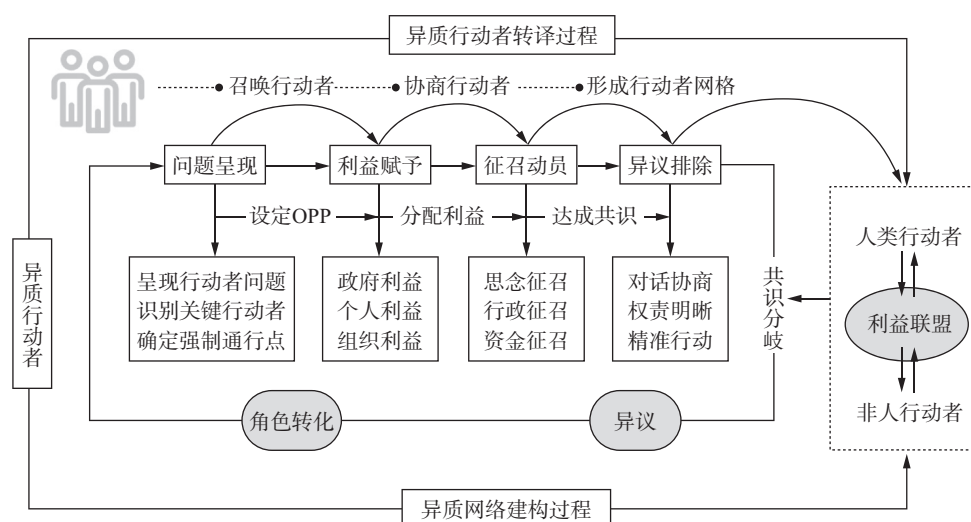


图4 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转译及运行过程

Fig.4 The transla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weight management year activities

3.1 问题呈现：确定体重管理年的强制通行点

问题呈现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首要环节,是核心行动者将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关注的问题或障碍呈现出来,并据此确定强制通行点的过程^[25]。该阶段有3个核心任务。一是呈现行动者问题。在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网络中,各类行动者均面临着异质性的问题与障碍。例如,政府部门面临着国民超重肥胖率持续增加及其引发的相关慢性疾病等问题^[26];个体行动者因处于多元健康信息交织的复杂环境,面临着信息甄别难度大、体重管理技能不足等问题;而医疗机构与相关企业则受到重治轻防的机制束缚与健康数据孤岛效应的影响,面临着健康与体重管理服务供给碎片化等问题。二是识别核心行动者。面对上述不同的现实问题,政府部门凭借其公权力的属性,能够提出并获得其他行动者普遍认同的行动方案。因此,政府部门是体重管理年活动网络的核心行动者,承担着维系关系、统筹管理与协调优化的重要职能。在实际运作中,政府部门既包括负责顶层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体育总局等中央部门,也涵盖负责区域统筹与具体落实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三是确定强制通行点。强制通行点是不同行动者为达成自身目标所必须经过的关键节点。在体重管理年中,各行动者面临的问题各异、目标多元,核心行动者需要敏锐识别各行动者在活动运行中遇到的具体障碍,并提出具有整合性的解决方案^[27]。对此,政府部门作为核心行动者将解决问题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确立为——实施体重管理年

活动,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遏制超重肥胖及其慢性疾病的趋势(图5)。

3.2 利益赋予：激发行动者参与体重管理年的持久动力

利益赋予是指核心行动者通过运用相应策略或措施,增强问题呈现阶段中其他行动者的认同或利益,推动各方履行其责任,协力保障网络的运行。置于现实场景,体重管理年活动通常面临着资源限制、利益冲突等困境。为推动活动有效运行,需将这些困境及时化解并向行动者赋予利益,以保障活动的有序运转。对核心行动者政府部门而言,通过体重管理年的顺利实施与可持续运行,能够回应我国慢性病井喷态势与青少年体质健康隐患加剧等时代挑战,提升我国的健康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生活质量的现实需求。对个体行动者而言,体重管理年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促进体系,能够提升个体的健康素养与自我管理能力,有效预防肥胖及相关慢性疾病。同时,个体在参与过程中,可获得社区、学校、单位等社会资源支持,如杭州市上城区通过“减重+体育”模式,整合卫生健康、体育管理等多方资源,建成覆盖全人群的“分布式”体重管理模式,为不同个体提供精准化健康服务。对其他行动者而言,在体重管理年共同目标的统领下,各行动者采取在物质上夯实人财物资源、在意识上提升利益相关意识与在组织上完善组织架构等,调整自身角色以获取预期利益。对数智技术、政策法规等非人类行动者而言,其本身并不具备类似人类的主观利益诉求,而是作为核心行动者治理实践的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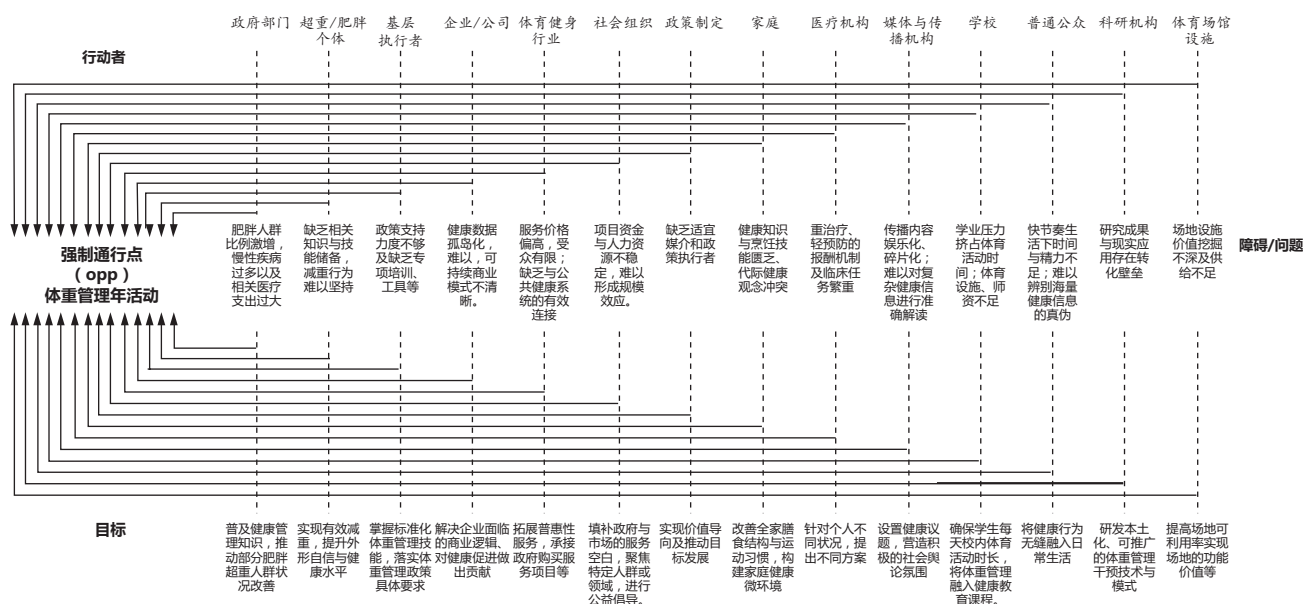


图5 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强制通行点

Fig.5 Mandatory companion points for the weight management year campaign

基础、制度工具等对活动运行产生结构性制约或发挥关键作用。这类行动者的“利益赋予”是指其被纳入行动者网络后,内在的能动性得以激活,并通过内嵌、融合、调用等方式作用于网络运行,在支持人类行动者履行职能的同时,也实际影响甚至重塑着网络中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路径与互动方式。

3.3 征召动员:构建体重管理年网络行动者联盟

征召与动员是核心行动者围绕OPP的愿景,协调、组织网络中的多元行动者,激发其承担相应职能,最终确立起较为稳固的联盟关系。置于体重管理年活动具体实践中,政府部门通过合理分配参与空间、明确各主体身份定位并保障其合法权益,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加入以政府为核心的体重管理年运行体系。具体包括:第一,理念征召。政府部门充分发挥理念引领作用,通过编制权威指南、开展健康讲座、运用新媒体平台等方式,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具体实践中,可实施全民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将“健康体重”这一核心观念渗透至社区教育体系、大众传媒内容等多个层面,逐步转变社会层面长期存在的“以瘦为美”单一审美倾向,倡导一种关注个体差异、注重身体功能健康的多元健康价值观。第二,行政征召。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制定、组织协调等行政手段,推动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全面实施。例如,国家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各级职责;各级政府部门基于各自实际,协调社区、医院与学校等单位组建执行网络,确保政策落地。第三,

资金征召。政府部门创新构建“财政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资金保障体系,为体重管理年活动提供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资源支撑。如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并要求地方政府按比例配套,同时创新市场化运作模式激发企业投资活力。

3.4 异议排除:维护体重管理年网络运行的关键

异质性是行动者网络联盟中固有的特征^[28]。异议是在网络运作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因目标或利益不同而引起的分歧或矛盾。异议排除则是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应对与化解行动者之间的异议,以维护网络的稳定性与持续运行。维系体重管理年行动者网络运行的关键在于消解各行动者存在的异议,若未能妥善协调各方异议,则可能阻碍体重管理年运行机制的有效建立。而体重管理年活动中需处理的问题有:第一,卫生健康部门、体育管理部门与企业公司等多元行动者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因缺乏明确的绩效考核互认、资金配套激励等利益分配机制,各方难以从协作中获取实质性收益问题。例如,受限于体重产品和服务的长周期的市场特征,被纳入行动者网络的企业公司发现产品或服务所获收益不佳、无法覆盖投入时,其参与动力便易因利益受损而衰减。第二,制度建设、资源与人才供给同基层实际需求存在不匹配问题,难以精准回应体重管理活动的现实痛点,尤其是体重管理领域专业人才供给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基层服务能力。例如,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我国运动康复师职业人才缺口达到

470万,基层与社区体育服务人员数量面临短缺,而发达国家占比超50%^[29]。第三,因地域、文化、认知等差异,城乡及不同年龄人群在健康知识、素养等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农村地区与老年人群体对体重管理的认知水平往往低于城市与中青年人群,这一现状易使健康干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区域与代际间的不均衡现象^[30]。

4 ANT视域下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困境审视

4.1 制度空转: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转译愿景锚定不力

第一,核心行动者引领不足。政府部门本应承担起定义转译愿景、征召并动员其他行动者的关键角色,制度通过提供规则、框架等^[31],但现有制度并未明确各行动者的权责边界与协同机制。一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问题依然存在。“体重管理”议题涉及政府部门、体育管理、企业公司等不同行动主体,但目前缺乏能够有效统筹的“核心行动者”,致使相关行动分散、协同不足。例如,在当前城市公共健康管理实践过程中,多未将城市空间管理纳入公共健康(特别是肥胖等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体系中^[32]。二是活动的推行缺乏坚实的法律法规支撑。体重管理年活动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和短期项目推动,未能上升至立法层面,其稳定性和约束力不足。

第二,政策执行路径不清。尽管相关政策已明确体重管理的预期目标,但受限于配套实施细则的缺乏,顶层设计的活动愿景难以有效转化为基层清晰的执行方案。一是执行主体跨部门协同治理碎片化。受制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不同部门间缺乏利益共享与协同执行规程,致使联动效应尚未充分发挥。例如,体育系统主导的公共体育设施与医疗系统的慢性病管理服务没有形成有效衔接;社区层面的运动干预方案常游离常规健康服务之外,导致体育在体重管理中干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33]。二是执行客体参与响应悬浮化。由于缺乏便捷、科学的参与路径与激励机制,肥胖和超重人群难以将体重管理内化为日常行为习惯,易使政策覆盖面与活跃度较低。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因缺乏具体的行动指引与反馈回路,我国成年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率仅为12.7%,多数肥胖与超重人群难以有效融入治理网络^[34]。

4.2 主体分化: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转译合力释放不足

第一,主体利益分化导致目标难以统合。受自身的组织属性、资源条件与目标追求不同的影响,多元行动者在参与体重管理年活动时会表现出利益诉求分化现象。就现实场景而言,体重管理的政府主管部门需要落实上级部门所交代的任务,更侧重于提升体重管理方面的具体指标,以期积累政绩;医疗卫生机构更为关注肥胖与超重人群的诊断、治疗以及相应的收入问题;基层执行人员重视薪酬、工作条件、职业发展等方面;体重管理的相关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关注市场效益以及品牌的曝光度等。

第二,价值共识分化招致认同感受限。异质性行动者内生性地决定了其在参与体重管理年活动时,呈现出差异化的价值排序与目标偏好。医疗卫生部门更加倾向于从慢性病防控的医学视角界定体重管理,强调指标筛查与临床治疗价值;体育管理部门则是从运动促进健康的角度切入,重视锻炼行为养成和健身服务的供给价值;普通民众可能仅仅将其视为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35]。就形式而言,这些价值张力不利于各行动主体建立理解和信任关系,从而影响责任共同体的形成。例如,学校在实施相关活动时,往往将其作为附加任务而非内在职责;企业参与其中更多出于社会责任的驱使而非价值内化。

第三,协同行动分化引致执行碎片化。即便各行动者在价值与利益方面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受制于资源匮乏与协同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行动者在实际协同中依然难以形成合力。例如,医疗机构虽已完成居民体重筛查工作,但由于相关制度并未明确“筛查数据向社区传递”流程,无法与社区对接后续的干预服务;学校所制定的体重治理计划也常因缺乏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而难以持续;就企业与社会组织而言,参与机制的不明确,使得他们的投入多流于短期形式。这种碎片化的行动状态,会造成转译过程出现中断的情况,行动者之间也无法形成功能互充的网络化运作模式。

4.3 网络弱化:体重管理年活动的主体转译效能不佳

第一,资源保障不足制约网络运行。资源是维

系行动者网络运行的关键,体重管理活动面临资源配置不均衡、供给不持续等现实问题。一是财政投入以短期化为主,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渠道,导致社区、学校等末端执行机构难以规划持续性服务。二是专业人力资源存在结构性短缺,兼具运动干预与健康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基层体重管理实践往往依赖经验式指导。三是物力资源供给滞后,尤其是数智化技术的应用深度不足。当前体重管理多停留于数据的简单采集与录入,缺乏集监测、干预、反馈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化服务平台,使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难以在运动处方生成与体重管理全流程中发挥应有的赋能作用。

第二,结构束缚阻碍内生动力。网络结构是多元行动者建立联系与协同互动的载体,也是彰显行动者能动性的基本前提^[36]。现阶段,因受行动者之间角色定位以及准入机制的制约,多元行动者参与体重管理年的能动性存在不足。一是核心行动者倡导多元参与,但对医疗机构、目标个体、企业公司、社区与学校等其他行动者的具体职责与服务边界缺乏清晰界定,这易使体重管理年活动在具体实践中出现功能重叠、协作阻滞等治理困境。二是体重管理年行动者网络缺乏有效的议事与表达渠道,难以形成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流程,这制约着转译过程的顺畅进行。

第三,激励考核缺位降低主体能动性。合理的激励考核机制是激发行动者持续参与,并强化网络凝聚力的关键。目前,体重管理年活动尚未建立与转译目标相匹配的绩效评价体系,现阶段的考核内容更侧重于短期的、可量化的指标,对体重控制率、居民健康改善等长期行为关注不足。此外,激励机制呈现单向化特征,主要依赖行政指令驱动,缺乏对基层人员、社会力量与市场主体的有效利益回馈,难以激发他们参与活动的主体能动性。

5 ANT视域下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应对之策

依据ANT转译视角,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困境根源在于转译过程的中断,即制度空转导致转译愿景锚定不力、主体分化削弱转译合力、网络弱化降低转译效能。围绕ANT的转译过程,聚焦当前实践,提出制度完善、主体激活与网络保障3条应对之策(图6)。

5.1 制度完善:锚定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转译愿景

在ANT中,问题呈现阶段的关键是确立一个能够整合多元主体诉求的OPP,使其成为所有行动者为达成各自目标所必须遵循的共同议程。而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是确立强制通行点、保障转译过程,推动体重管理年活动实现预期目标的基本前提。

第一,凸显核心行动者的引领作用,提升OPP的牵动力。OPP由核心行动者发起,对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具体实施与愿景实现发挥关键作用。完善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制度体系应立足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宏观愿景与总体部署,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中关键问题出发,综合考量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的双重职能与责任,兼顾制度设置的目的性和系统性。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要围绕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综合梳理、精准定位,形成以“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遏制超重肥胖及其慢性疾病的趋势”为目标的专属性制度安排。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司局牵头,通过对体重管理年充分调研基础上研制颁布体重管理年的考核、激励与退出政策。在确保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性和承接性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施策。同时,从体重管理视角细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法律解释,实现体重管理与既有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为体重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细化体重管理年的执行路径,强化异质行动者的协同转译。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推进体重管理年活动中,清晰且可操作的执行路径已成为将制度愿景转化为实质治理效能的前置条件。针对当前活动运行的执行阻滞,核心行动者应构建可量化、可反馈的执行机制,为多元主体在异质交织的治理网络中提供清晰的路径支持。一是建立跨部门协同操作规程,破解治理碎片化。应明确卫生健康、体育管理等职能部门在体重管理年活动中的具体职责、协作流程与信息共享机制,形成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的工作指南。例如,在体医融合过程中,应明确医生开具运动处方与体育指导员提供干预服务的衔接流程与权责划分,消除部门间的协作阻滞。二是研制场景化的行动指引,消除参与悬浮化。针对超重人群有意识无行动的空转困境,制度供给应从目标导向转向过程支持,各级政府通过出台相应的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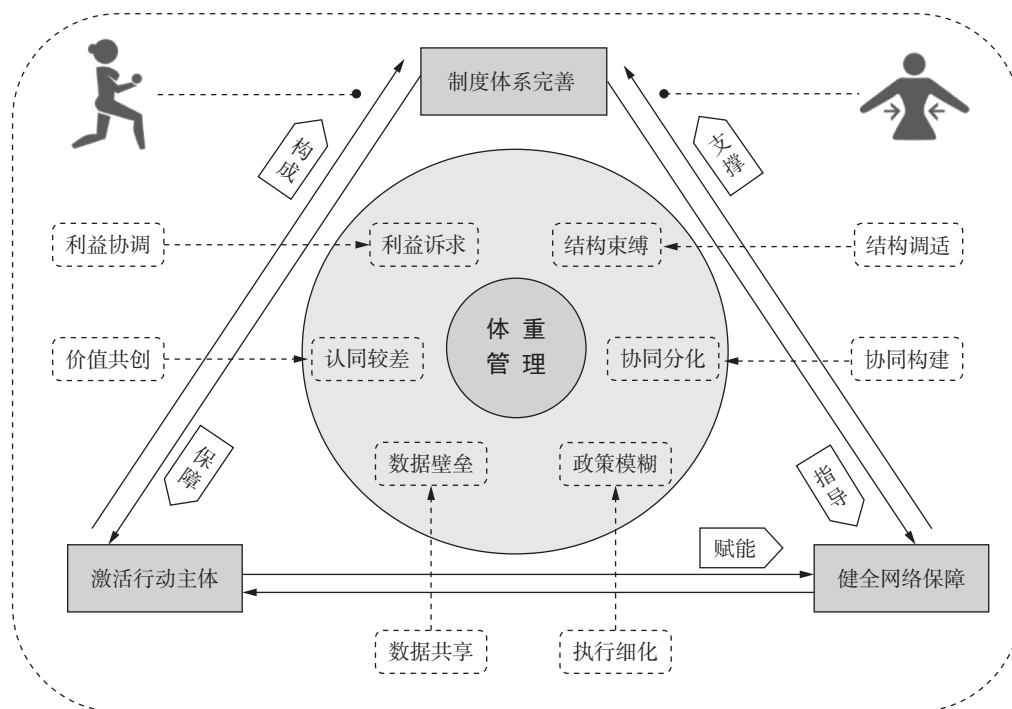


图6 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实践路径

Fig.6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weight management year campaign

套方案与利用数字赋能将抽象的体重控制目标拆解为每日可执行的运动处方与膳食清单,为肥胖与超重人群提供一套“听得懂、做得到、有反馈”的精准行动方案。可参照沈阳经验,其在《沈阳市“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中构建了涵盖“5大专项行动、11类健康支持环境”的工作体系,将抽象的目标转化为具象化场景任务。

5.2 主体激活:释放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转译合力

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下,转译是核心行动者通过利益赋予与征召动员等环节,引导多元行动者基于共同目标形成协同行动的动态过程^[37]。行动者主体能动性是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关键驱动力,直接影响着体重管理年的实施成效。由此,构建“利益协调—价值共识—主体共进”行动框架,系统协调多元主体的行动,释放转译合力,提升体重管理年网络运行的稳定与可持续。

第一,强化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筑牢体重管理年共赢根基。行动者网络的持续运行依赖于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协调并满足不同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是核心行动者激发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的关键。一是应确保利益表达的畅通性。政府应当加强与其他行动者的沟通交流,明确各主体的利益诉求,提升决策民主化水平,寻求最大共同利益。二是提升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根据各行动者在体重管理年中的贡献程

度、所承担风险等确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协调方案,助力体重管理年的持续运行。可借鉴日本“健康积分”制度经验,构建由政府主导、科技企业协同的数字化健康积分体系,居民通过参与体质监测、健康讲座、达成步数目标等健康行为获取积分,并可在指定合作场所兑换产品或服务,从而将健康的长期收益转化为即时激励,增强参与意愿。同时,对提供兑换服务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宣传支持,并借助制度公信力吸引健康消费群体,提升其客流量。由此,通过精准回应居民、企业与政府等多元主体的核心诉求,形成可持续的体重管理运行模式,实现健康促进与经济发展的多方共赢。

第二,建构公共健康价值认同,凝聚体重管理年行动共识。ANT视角下,价值认同是多元异质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文化理念与行为规范等,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趋同,形成对于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行动共识。该共识的形成,源于公众个体对健康的迫切诉求,并以提升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为价值取向。一是强化“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文化塑造。体重管理的文化环境源于体育文化、健康文化的交融互促,需融合体育与健康文化,营造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氛围;同时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以提升公共健康水平。例如,推动医疗机构联合体育科研场所、社区等行动主体,为不同超重肥胖

人群定制干预方案,提供针对性运动建议与膳食计划。二是明确“为人健康所需”的活动目的。各行动者需积极沟通、协商,将自身诉求和价值愿景融入体重管理年的行动目标中。具体而言,医疗机构通过提供专业健康指导获取居民健康数据,体育企业借由场馆共享获得政策支持,社区组织借助承办相关活动提升治理效能。通过协调资源交互在动态运行过程中逐渐凝聚行动共识、增强转译合力,共同推动“体重管理年活动”这一强制通行点的实现。

第三,构建跨界融合行动方略,推动体重管理年长效发展。步入数字时代,公众对于体重管理的需求日益复杂多样,仅依靠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或家庭等某一类主体独自开展,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须推动多元力量协同推进。因此,核心行动者应重点关注体重管理年活动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借助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来实现社会资源的系统化配置。具言之,政府主管部门要建立跨部门组织协调的机制,厘清各行动主体的权责边界,促进体重管理信息共享、协同决策,如设立专门的跨界协作机构、建立合作框架等。各级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或进一步优化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跨界协作方式,负责区域内体重管理活动重要事项的决策。同时,可由国家卫生健康部门牵头,联合具备公共技术服务能力的科技企业,共同开发集健康激励积分兑换、标准化数据接口与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生成等模块的体重管理应用程序。

5.3 网络保障:提升体重管理年活动的转译效能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尼尔·瑞克曼(Neil Rackham)指出,贡献、亲密、愿景是联盟关系维系的三要素^[38]。资源共享、结构调适和考核激励是体重管理年行动者贡献、亲密、愿景关系构建的关键。三者协同可有效推动体重管理年行动网络动能不断积累与结构持续优化。

第一,资源共享,夯实体重管理年活动基础。在体重管理年行动者网络中,资源协同与要素流通是打破主体间协作壁垒、推动多元行动者实现深度合作的关键,而数智化技术是提升资源保障效能的核心支撑,需构建“资金+人才+数智技术”三位一体的资源要素保障体系。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财政部等部门,研究设立“体重管理年活动专项基金”,并明确资金的分配比例。其中40%的资

金应用于场景设施建设与智能硬件配置,除了推进“活动方案”中明确规划的健康主题公园、健康食堂等场所建设外,重点在社区、学校中配置智能体脂监测仪、运动负荷追踪设备等数智化工具;30%用于专业人才的培训,缓解基层服务力量薄弱的问题;20%用来支持社区、学校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10%专项用于综合性的体重管理数据平台的开发与维护,推动体重管理日常化与便利化、规范化。在政府引导基础上,应积极吸引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参与资金投入与技术共建。同时,依托数智技术构建跨部门的“体重管理资源云图”,整合医疗机构、学校与企业的各类资源,制定统一的资源登记、借用与流转标准,明确使用流程与责任主体。例如,在学校体育设施开放中,建立数字化的线上实名预约系统,通过数据流明确开放时段、厘清安全责任并关联保险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风险兜底机制,提升资源协同与要素流通效能。

第二,结构调适,完善体重管理年活动框架。行动者关系网络是在特定结构框架下,通过彼此间转译与互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体重管理年作为一项普惠性治理实践,涵盖政策保障、资源支持等多个层面,需有效调适网络内部的结构刚性与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一是建立审核与准入机制,明晰体重管理服务供给的准入标准与资质要求,确保符合条件的行动者能够参与网络运作,以实现多元知识、经验、技术等体重管理服务中充分交织、交融。二是明确行动者的角色与责任,激发网络潜能。卫生健康部门需承担统筹协调职责,通过跨部门协作机制,实施常态化监测与督导;体育部门应负责公共服务内容供给,推广具有普适性的运动干预方案,如八段锦与工间操等。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激发体重管理年行动网络中家庭层面的能动作用,明确并强化家庭在健康生活习惯养成与体重管理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第三,考核激励,激发体重管理年活动动能。为保证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质量和效率,还需建立动态考核与长效激励的良性循环。一是成立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学校以及健康促进领域领导、专家与基层执行人员等组成的考核评估工作组,定期开展体重管理年活动绩效评估,并在省级、市级层面公布考评结果,同时建立监督反馈渠道,健全公

开、透明的监察途径。二是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奖励在体重管理年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机构、组织、企业与个人,增强其持续参与的积极性。例如,对体重管理成效突出的机构、组织与个人通过授予证书、提供物质奖励等方式予以表彰;遴选并推广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活动模式与项目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持续优化体重管理服务内容与形式,着力塑造具有影响力的体重管理年特色品牌,推动体重管理年行动者网络长效运行等。

6 结论

体重管理年是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性实践载体,也是应对慢性病负担与健康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制度创新,更是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人口质量的必然举措。研究创新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弥补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体重干预技术而疏于行动网络分析的局限,为分析体重管理年的运行实践、实现体重管理年的价值愿景提供了思路。以转译为抓手,呈现了理想状态下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的过程机制,并基于“制度—主体—网络”的研究脉络,探讨体重管理年活动运行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应对之策。作为一种具有明确国家战略导向的公共行动,体重管理年已引发社会广泛响应,有望从公共卫生、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维度释放出广泛而深远的价值红利,为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激发产业创新动能和夯实人力资本注入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 [1] 吴东哲,瞿超艺,饶志坚,等.中国及全球成年人归因于超重和肥胖的疾病负担变化趋势与未来风险预测[J].体育科学,2025,45(5): 3-16.
- [2]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3] 习近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N].人民日报,2016-08-21(001).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4-06-06)[2025-07-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6/content_6959543.htm.
- [5] 武亦文,王和民.论健康促进实现的法治保障——以“健康融入万策”框架为基础[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7(2): 159-170.
- [6] 孙科.认知、表征与行动——体重管理与体育作为[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5,45(1): 100-110.
- [7] 郭文,邵文珍,郭吟,等.HAES干预对肥胖青少年进食障碍倾向和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体重自我污名的中介作用[J].体育学刊,2024,31(5): 62-67.
- [8] 杜思慧,成刚,于文珊.体重受同伴影响吗?——基于班级单位的实证考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12): 85-99.
- [9] 高思焱,吕万刚,聂应军.不同运动方式对中国超重或肥胖人群代谢指标影响的元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21,57(10): 46-54,69.
- [10] 戴健,史小强.健康城市背景下全民健身发展的内涵特征、现实问题与推进策略[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5,40(1): 28-36.
- [11] 成刚,董彬怡,齐易初,等.如何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人力资本?——基于体重视角的研究[J].教育经济评论,2025,10(2): 86-108.
-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的通知[EB/OL].(2024-12-31)[2025-07-17].<http://www.nhc.gov.cn/ylyjs/s3573d/202412/4cf1905d32304c15ac3bc4446ddb83f1.shtml>.
- [13] MOHAJAN D, MOHAJAN H K. Obesity and its related diseases: a new escalating alarming in global health[J]. Journal of innovations in medical research, 2023, 2(3): 12-23.
- [14] VEKIC J, ZELJKOVIC A. Obesity and dyslipidemia[J]. Metabolism, 2019, 92: 71-81.
- [15] VGERINOS K I, SPYROU N, MANTZOROS C S, et al. Obesity and cancer risk: Emerging biological mechanisms and perspectives[J]. Metabolism, 2019, 92(4): 121-135.
- [16] 李瑶玥,王桂新.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居民肥胖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2022,28(5): 107-125.
- [17] 李海明,张晓莉.健康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2023,45(5): 103-114.
- [18] 彭国强,舒盛芳.美国运动健康促进服务体系及其对健康中国的启示[J].体育与科学,2016,37(5): 112-120.
- [19] 陈园,王珂,史赤天,等.日本《全球健康战略》的实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药物与临床,2023,38(12): 3145-3149.
- [20] 张浩楠,杨剑.大学生身体活动与健康:健康和教育政策的跨领域融合发展研究[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25,31(8): 869-875.
- [21] VASIST P N, KRISHNAN S. Engaging with deepfakes: A meta-synthe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theory[J]. Internet Research, 2023, 33(5): 1670-1726.
- [22] 严敏,郭微同.数字何以入乡土?——行动者网络理论下数字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过程与机制[J/OL].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2025-09-22].
- [23] 沈培,李建清.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11): 117-126.
- [24] FREEMAN M. The analytic rewards of materializing the effects of actor-networks[J]. Qualitative Research, 2019, 19(4): 455-470.
- [25] 张立国,李静,贺宝勋.行动者网络视域下数字支教的常态

- 化机制构建[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5,37(3):78-85,112.
- [26] 朱志强,徐巧玲,邵雪云.肥胖和超重儿童参与身体活动的健康效益:系统综述的系统综述[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25,31(3):296-305.
- [27] 王雪丽,彭怀雪.非遗扶贫项目合作网络的创建过程与运行机理探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J].江淮论坛,2020(3):18-25.
- [28] 刘奉越,李燕.乡村成人学校何以助推乡村振兴——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审思[J].教育学术月刊,2022(8):27-33.
- [29] 崇玉萍,于沁,李文.新质生产力赋能社区老年“体医养融合”健康服务困境与纾解[J].体育学研究,2024,38(4):33-42.
- [30] 朱晓龙.“体重管理年”的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5,39(4):19-28.
- [31] 张越,林志义,杨海晨.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二元困境及关联视角超越——基于行动者网络方法论形成脉络的思考[J/OL].上海体育大学学报,1-12[2025-09-23].
- [32] 张可,郑舒文.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影响研究[J/OL].体育学研究,1-25[2025-12-05].
- [33] 黄越,李毅然,李勇,等.体医融合赋能全民体重管理的价值意蕴、现实梗阻与纾解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5(8):69-76.
- [34] 尹振捷,韩朦,杨珏,等.史密斯模型视角下全民健身政策执行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23(9):55-62.
- [35] 张佳佳,张宗豪,黄美蓉.逻辑·架构·路径:区块链赋能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可能性探索[J].体育学刊,2025,32(3):145-152.
- [36] 王文龙,崔佳琦,邢金明,等.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退役运动员进校园合作网络建构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3,37(4):30-41.
- [37] 张伟国,蒋亚斌,卢文云.体医融合协同创新的机制、困境与破局——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8):48-60.
- [38] 龙宝新,李莎莎.行动者网络视域下学校课后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研究[J].教育科学,2024,40(1):36-42.

作者贡献声明:

张佳佳:提出论文选题,撰写、修改论文;曲鲁平:设计研究框架,审核、指导、修改论文。

Mechanism,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Year of Weight Management” Initiative —An Analysis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ZHANG Jiajia, QU Lup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The Year of Weight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aken by China to address the high incid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support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t is also a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t present. By apply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reasoning, and through the meso-oriented actor-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weight management year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Year of Weight Management is not only a concret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the country's maj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goals, but also a practical need to respond to 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obese people in China, and more importantly, a response to the global trend of health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s operational mechanism is essentially a practical process led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with innovative entities such as medical institution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innovative elements like concept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ll participating as actors. Specifically, it covers aspects such as problem presentation, benefit granting, recruitment and mobilization, and resolution of objections. At present, the Weight Management Year campaign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weak anchor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due to the institutional inertia, the insufficient translation synergy caused b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ubjects, and the poor translation efficiency due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network. In response to this, it is proposed to start from dimensions such as system improvement, subject activation and network guarantee to address the translation predicament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ear of Weight Management.

Key words: Healthy China; overweight and obesity; policy optimisation; national fitness; heterogeneity; non-corporeal actants (NCA)